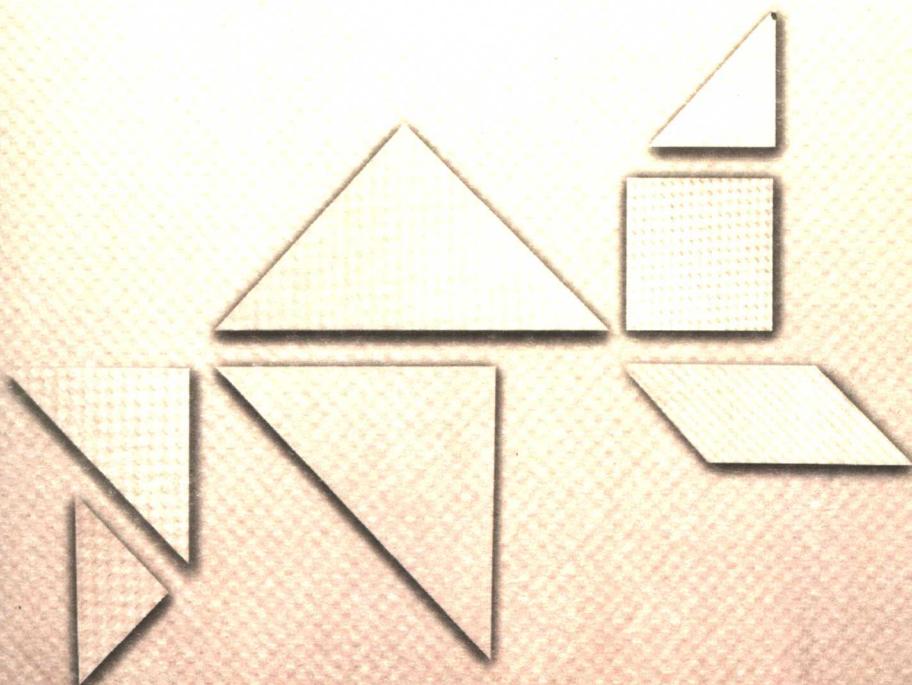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高宣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高宣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ISBN 7-5608-2925-2

I. 布… II. 高… III. 布迪厄—社会学—学术思想一研究 IV. C91-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597 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高宣扬 著

责任编辑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 恬 封面设计 林家阳 陈益平

出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206 000

印 数 1—310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25-2/B·17

定 价 1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丛书总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现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 20 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 20 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五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

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年10月

作者自序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近 15 年来连续研究布迪厄社会理论的一个成果,同时也是为了实现一项承诺。我从 1983 年经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拉毕卡教授介绍,第一次同布迪厄见面以后,就经常向他讨教,并同他讨论他的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从那时候起,我就萌生撰写一本论述布迪厄理论思想的中文专著的意念。1991 年,我曾经在法兰西学院布迪厄办公室同布迪厄谈及我多年来学习他的理论的心得,并把自己写这本书的计划及其大纲翻译成法文,征求他的指导性的意见。他早就期望中国读者和学术界能够对他的理论做出反应,答应会为我的这部书写序。为了使我写好这部书,他慷慨地将他整理好的著作目录以及所有出版过的专著都送给我。这 10 年来,他每出一本新书,也会立即送来。他并时时询问我的写作进度,一再嘱咐我一定在脱稿之后通知他,以便及时地为本书写序。可是,由于我的写作过程必须经历反复思考和钻研,实在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在逐步深入了解他的理论及其概念的基础上,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再加上课务及其他研究任务繁忙,致使这部书的写作进度缓慢,延至去年年底才脱稿。

不幸的是,布迪厄的病况的恶化程度,远比我们所预料的严重。当我试图让他知道这部书即将完稿时,他却因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写作,体力透支过度,所患癌症已迅速恶化,一再地处于昏迷状态。更令我伤心欲绝的,是他在这本书出版的前夕,即今年年初与世长辞。惊闻噩耗,我久久不能平静。悲痛交加之中,同他接触和交往的无数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在目;他的慈善为人及其孜孜不倦、勤奋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令我永志不忘。历经半个世

纪,他的作品与时间竞走,蒙受岁月淘洗,其基本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却仍然令人反思不已。贵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终身讲座教授,又生活在最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他的心目中,所魂牵梦萦的却是成千成万劳苦大众的命运。当我和拉毕卡及布迪厄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经常向我谈及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边教学、边支持当地劳工进行社会改革的岁月,也谈及他们在 1968 年投入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革命场面。近 20 年来,面对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甚嚣尘上,他始终以严肃态度给予不停顿地批判和揭露。当德国实现统一而使原东德知识分子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是他发起了声援原东德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同法国及欧洲各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起,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他的《世界的贫困》(*La misère du monde*)一书完成后不久,他立即嘱秘书航寄给我,并在长途电话中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对资本主义媒体不厌其烦地、盲目地加以赞颂的“全球化”的讽刺和抨击。最近几年,当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几乎吞没第三世界的自主经济,并将各国弱势经济力量都排除到受宰制的边陲地位的时候,他还继续抱病参与各种反全球化、支持弱势经济力量与团体的运动,并揭露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真掠夺、假平等,真单调(mono-tone)、假多样化,真同质化(homogénéisation)、假多元化的手段和策略。

为了准确表达布迪厄的基本思想及其概念,我多次向他请教有关 *Habitus*、*champs* 以及 *violence symbolique* 等重要概念的意涵。他的反复讲解使我获益良多;其中关于 *Habitus*,尤其令我思路豁然开朗。很多人只是从这个词的表面意义去理解,很容易同原拉丁文 *habitus* 以及同其他学者,例如埃利亚斯所用过的同一个 *habitus* 概念的意涵相混淆,以致将它误译成“习惯”、“惯习”、“习气”等等。我将它译成“生存心态”,主要就是要全面表达其意义,并凸显布迪厄的创意性。他在多次的解释中强调,即使就其拉

丁原文来说,它并不只是表示“习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描述人的仪表、穿着状态以及“生存的样态”(mode d'être)。être 就是“存在”、“存有”、“生存”、“是”、“成为”等的意思。某人之为某人,某物之为某物,某一状态之为某一状态,都由其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基本样态所决定。Habitus 的基本原意,正是要表示在当时当地规定着某人某物之为某人某物的那种“存在的样态”。不过,在古拉丁文中,这种样态,还更多地停留在对于表面状况的描述,尚未涉及深层的内在心态因素,更不是从动态和活生生的、内外相通的观点来论述。布迪厄改造了这个拉丁原词,赋予新的意义:它是一种贯穿行动者内外,既指导施为者之行动过程,又显示其行为风格和气质;既综合了他的历史经验和受教育的效果,具有历史“前结构”的性质,又在不同的行动场合下不断实时创新;既具有前后一贯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随时随地会在制约性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既表达行动者个人的个性和秉性,又渗透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阶层性质;既可以在实证的经验方法观察下准确地把握,又以不确定的模糊特征显示出来;既同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策划相关,又以无意识的交响乐表演形式客观地交错纵横于社会生活;既作为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而以感情心理系统呈现出来,又同时地主动外在化而影响着生活和行动过程,并不断再生产和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既是行动的动力及其客观效果的精神支柱,也是思想、感情、风格、个性以及种种秉性形态,甚至语言表达风格和策略的基础。总之,Habitus 不是由于长期行动过程而被动地累积构成的个人习惯、惯习或习气,不是停留在行动者内心精神世界的单纯心理因素,不是单一内在化过程的静态成果。它是一种同时具“建构的结构”和“结构的建构”双重性质和功能的“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système de dispositions durables et transposables),是随时随地伴随着人的生活和行动的生存心态和生活风格,是积历史经验与实时创造性于一体的“主动中的被动”和“被

动中的主动”，是社会客观制约性条件和行动者主观的内在创造精神力量的综合结果。我之所以用“生存心态”这个词来表示布迪厄的 Habitus 概念，就是要强调它是伴随着生活、行动的始终，并同时实现内化和外化双重过程，完成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两方面双向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存心态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行动而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它又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层结构化，并持续地影响着思想和行动的客观社会结构的化身。在生存心态的概念中，典型地表现了布迪厄将主观与客观共时运作的复杂互动状态加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的尝试，是他的“建构的结构主义”或“结构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的特征的集中表现。

我已在以往许多论文和演讲中反复说明布迪厄理论思想的反思性和象征性。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凸显布迪厄理论思想的反思性和象征性特征。

这本书对于布迪厄理论思想的论述，并不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更不打算追随传统社会学论述方法，把他的社会学理论描述成布迪厄本人所摒弃的那种仅限于经验主义社会学狭隘范围的样子，而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整合性多学科相互补充的动态景观，对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进行重点的分析。

在布迪厄刚刚去世的悲伤时刻，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我对他由衷哀悼和怀念，也希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于他的理论思想的更深研究。

高宣扬

于 2004 年 9 月 22 日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引言

在当代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历程中,作为法国当代最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以独创性的学术活动和丰裕的理论创作,已经在法国和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一阵阵争论浪潮,推动着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并使对于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活动,走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开辟了更加广阔前景,而且也使之更有效地适应着千变万化的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布迪厄于2002年1月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时,人们发现:在他身后为世界文化宝库所遗留的,是难以估价的丰富创作产品。他的著作博大精深,再加上他经常以象征性方法和含蓄的修辞进行表达,使他的著作及其论述的深刻内容,非经多次迂回反思的途径,不能全面正确把握。要理清他的基本思想脉络,首先要从他的理论思想基础及其历史形成过程的特征出发,同时掌握他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在开始的时候,布迪厄为了克服传统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差和缺点,试图综合古典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基本思想,同时又全面吸收100年来法国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幸运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使他有机会和有可能从李维史托和弗洛伊德那里得到重要启发,使他能够创造性地改造了李维史托的“结构”概念,灵活地提出带有革命性的新概念:“结构的建构主义(或建构的结构主义)”(le constructivisme structuraliste ou le structuralisme constructiv-

iste)；同时，他又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中，吸收“否认”(Verneinung; dénégation)等重要概念，使之成为他的崭新的正当化理论的核心观念。

布迪厄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在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其实际意义、反思性及其整体性。研究他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都势必关联到他的其他重要概念，使我们对于各个概念的理解，都不得不在其概念的相互关系总网络中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他的概念的理解和分析，严格地说，都不能就某个概念单个地或孤立地进行，也不能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封闭起来；而是要在反复地同其他概念的联系中，进行多次反思和多重阅读。布迪厄曾一再地强调其理论和方法的象征性(symbole)、反思性(réflexivité)和相关系性(relationalité)，就是为了避免把他的概念和任何研究结论当成僵化和固定不变的教条。

布迪厄一向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性的有形结构，也反对把社会当成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外在于社会学家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布迪厄也反对将行动者同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单纯二元对立。布迪厄进行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人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他从一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时，就明确地把握贯穿于人类社会生命体中的三大主要力量，即人与人之间的“力的紧张关系”(rapports de force)、“正当性”(légitimité)及“信仰”(les croyances)。这三大因素相互渗透，共时地来回内外穿梭于社会以及生活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之间。但现代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再生产为主轴的新型生命共同体。所以，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的产物，而这个复杂的相互关系，无非就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干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也就是说,人以其文化创造了社会,但社会也同时地成为人的生存和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人的创造活动,成为人的生存及其创造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人同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互动之中。这样一来,人同其社会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而组成这个双重结构的双方,一方面各自向对方施展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对方的制约,使两者之间发生共时的双向互动和互制。

从 1966 年发表《继承者》以后,布迪厄更集中地研究文化再生产以及统治和象征性暴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象征性暴力日益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现代社会中,被统治阶级 (*les dominés*) 不得不,并无意地被纳入象征性暴力的运作漩涡之中,成为象征性暴力的主要牺牲品。因此,在社会中处于劣势或弱势地位的被统治阶级,时时刻刻都受到整个社会的现成的不合理的社会条件的挤压,被迫地在他们的生存心态中内化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反过来又成为当代社会各种象征性暴力泛滥肆虐的社会基础。

在布迪厄的思想整体中,最关键的是他对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性质的深刻分析,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当代社会文化结构及性质的象征性”。当代社会是以其文化再生产活动作为基本动力的,而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再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和双重分化特征。他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就是心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共时双重分化;而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中的分化 (*la différentiation de 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de la société moderne*),就是整个社会分化的基础;文化再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双重分化,作为一种最复杂的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实践 (*la pratique symbolique*),它呈现出文化再生产分化同社会分化之

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既是社会区分化的主轴，但又受到社会区分化的影响；在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活动中，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主体，既以其象征性实践活动，实现其自身的自我区分化，又进行着客观化的区分活动，使主体和客体之间，行动者与社会之间，在文化区分化活动中，发生象征性的互为区分化的过程，并产生互为区分化的效果，并使整个社会表现出象征性的结构及性质。这些文化再生产的区分化活动，隐含着当代社会文化中各种权力网络的介入及干预，而且它们是通过以语言为中心的象征体系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所以，深入把握布迪厄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又意味着深入探讨他的语言象征性权力运作逻辑的理论。

作为他的主要概念的文化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及其“象征性实践”基本范畴，实际上又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紧密相联系；而在这些其他概念中，“生存心态”(*Habitus*)、“场域”(*Champ; field*)、“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 Social Conditioning*)、“资本”(*Capital*)、“语言交换市场”(*le marché de l'échange linguistique*)以及“象征性权力”(*le pouvoir symbolique*)等，是最重要的。在弄清楚上述各个概念的基本意涵之后，仍然还要再一次从整体的角度，将上述概念连贯起来，在其相互关系中进行反思、再反思。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学术顾问及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托尼·安德列安尼(Tony Andréani), 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 巴黎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 法国哲学会主席, 法国
精神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贾克·董特(Jacques D'Hondt), 法国哲学会前主席, 法国布阿济
耶大学终身教授

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 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兼哲
学系主任

安德列·多舍尔(André Tosel), 法国尼斯大学前副校长, 巴黎第
一大学和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主编 高宣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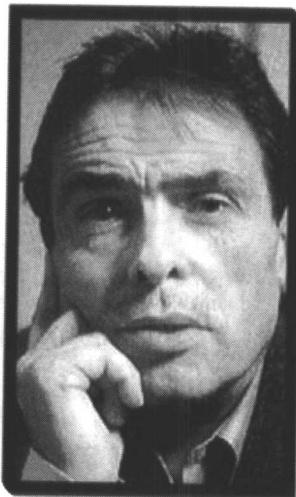
编委 (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家琪 杜小真 段德智 冯俊 高宣扬 郭宏安

刘国英 刘小枫 莫伟民 钱捷 尚杰 孙向晨

孙宜学 孙周兴 汪堂家 许钧 徐卫翔 杨大春

于奇智 章仁彪 张尧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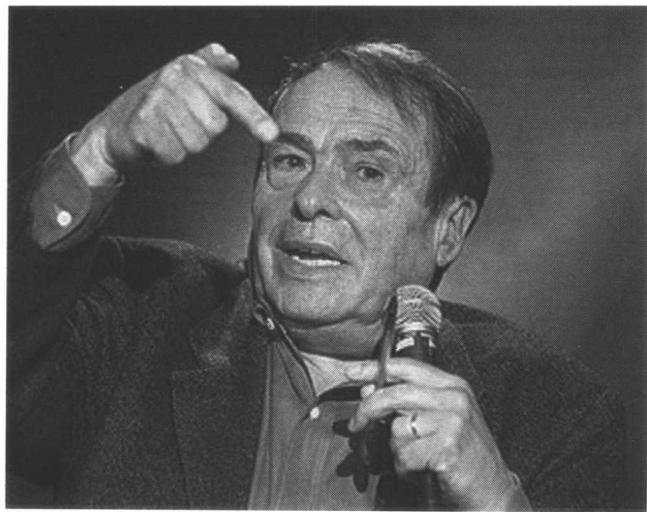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本书作者与布迪厄探讨社会理论问题



本书作者与布迪厄摄于巴黎



本书作者与布迪厄于法兰西学院研究室